



文化记忆

点校二十四史的大师们

■赵珩

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，是中国学术史和出版史上的一项伟大工程，从上个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，二十四史的点校历时近20年。

严格说，应该分为两个阶段：第一阶段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“文革”前夕，而第二阶段是从1971年5月到1977年11月《宋史》出版，全部点校工作完成。

翠微路2号院最里面有两座L型的宿舍楼，叫西北楼和西南楼。当时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同在这个大院里办公，西南楼是“商务”的宿舍，西北楼是“中华”的宿舍。每座楼都是三层，各有三个楼门。我家住在西北楼二门二层一套三居室中。

从1963年初开始，西北楼就陆续住进参加整理二十四史的各地专家学者。房间的配置是每位一间，布置十分简单，类似招待所的性质。很多教授在回忆这段生活时都很怀念，主要是那里比较幽静，更兼那时三年困难时期刚刚过去，条件相对好转。外调来的专家学者不用做饭，一律在南面的大食堂吃小灶。经常看到他们围坐在大圆饭桌前吃饭。鸡鸭鱼肉每顿都有，还经常能吃到外面买不到的大黄鱼、海参、对虾什么的，伙食相当不错。每逢春节，多数住在这里的教授学者都要回去过年，整个西北楼三号门里空荡荡的。

我的父亲生于1926年，1958年

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时只有32岁，后来他主持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时，也不过三十六七岁。那段时间，我记得每到周日的上午都有老先生们来我家，主要是就点校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校勘体例等与父亲商量。

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。王先生不但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史学家，也是执教山东大学40年的教育家，门人学子遍布海内外。不过我见到的王先生却是非常谦和慈爱，没有任何学术权威的架子。他方方的脸，比较胖，总是笑嘻嘻的，说话细声细气。他在西北楼住的时间较长，也常来我家。

1966年11月，彼时二十四史点校第一阶段因“文革”而停止，王先生也早就回到济南。当时我借着“串联”之名去游山玩水，到济南就直奔他在山东大学的家。我对他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庭和睦，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，也能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气氛。他让两个孩子第二天陪我去游大明湖，临走还特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买东西，必须回家吃饭。

唐长孺先生也是专治魏晋南北朝史的学者，执教于武汉大学。那时同唐先生一起住在西北楼的还有他的学生，也是他的助手陈仲安先生，陈先生实际上也参加了这项工作。唐先生的个子比较高，陈先生矮一些，两位都是高度的近视眼，眼镜片都像瓶子底一

样厚，看得出来是一圈一圈的。陈先生除了要协助唐先生工作，还要照顾唐先生的生活起居，足见“有事弟子服其劳”的古训。唐先生说话走路喜欢仰起面孔，这也是平时的习惯，并非是傲气。陈先生随侍左右，寸步不离。

最有意思的是这师生两人在晚饭后的散步。“亦步亦趋”这个成语在他们师生二人身上得到最真切的体现。两人遛弯时，陈先生总是在唐先生身后一步之遥，不论快慢，这个距离是不会错的。但两人的步伐却是完全一致，有的时候陈发现自己的步子错了，就会马上调整过来。

我对卢振华教授的印象很深。他在点校二十四史中主要是负责《南史》和《梁书》的标点。卢先生有个儿子叫卢今玗，比我小两岁。卢先生非常溺爱这个儿子，几乎是有求必应。这位卢公子在生活上又比较讲究，喜欢追逐时髦。他一直磨着卢先生给他买一辆二六型号的新自行车。当时买车的钱倒不是问题，关键是要票。于是卢先生为了儿子到处奔走，逢人就打听哪里能弄到自行车票，再有就是咨询到底是买二六的还是买二八的，是买“飞鸽”的还是买“永久”的。卢先生很少来我家，但有次特地为儿子买车的事登门造访。他一口湖北话，将二六自行车的“二六”永远读作“而流”，从此我们也管二六自行车叫“而

流”，这在我家成了个“典故”。

中山大学的刘节先生资格很老，曾受业于王国维、梁启超和陈寅恪先生，毕业于清华大学国学院。“文革”中刘先生替老师陈寅恪挨斗的事在学界广为流传，他无论在治学还是为人上都有“士”的风骨。在当时住在西北楼的教授中，他的年龄属于比较大的，但走路很快，一点没有老气横秋的样子。从食堂吃完饭后，他常常第一个快步走回宿舍。住在西北楼的时候，他不太与人交流，也很少看到他出来散步。

中央民族学院（今中央民族大学）的傅乐焕先生是傅斯年先生的侄子，早年曾在傅斯年的举荐下在史语所任助理研究员。他虽然家在民族学院，但也住过西北楼，与父亲交谊很好。他主要是负责点校《金史》的工作。

1966年5月，“文革”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，但是大专院校已经是急风暴雨。欲加之罪何患无辞，傅先生被诬陷，揪斗多次。不久，他就在陶然亭投湖自杀。大概傅先生是“文革”中最早自杀的学者，他的死给了父亲极大的刺激。我还记得，消息传来，父亲既不敢声张，又很紧张，也异常难过，辗转反侧，彻夜未眠。

傅先生的卒日，也是“翠微校史”第一阶段的终结。从1966年四五月间起，西北楼里的教授们陆续走光。

（摘自《逝者如斯 六十年知见学人侧记》）



人物故事

吴宓的“不苟”

抗战期间，吴宓应邀到乐山武汉大学讲学，引起轰动。吴宓是国民政府教育部聘教授，这种教授名额很少，乐山工商界的陕西同乡会非常敬重这位老乡，决定举行宴会招待他。席间有人请吴宓讲讲做人的道理，吴宓说：“我想就是‘不苟’二字。”

“不苟”，就是为人处世认真、诚信，一切以客观的是非为是非，不苟且，不敷衍。它既是吴宓对在乐山做生意的老乡们的希望，也是他一生的座右铭。

吴宓一生都在大学里度过，他的第一身份是老师。从上课的生动形象和号召力来讲，他赶不上胡适、钱玄同等，但他教课的认真态度却是一般老师无法比的。早年的学生温源宁说，他“讲起课来就像罗马舰船上的划桨奴隶在做工”，讲课涉及的引文，别人都照着参考书朗读，或抄在黑板上，而他总是背诵出来；讲解什么问题，他会像军训教官一样，有条不紊。虽然有些枯燥，但不会言不及义。他上课很有个人见解，也有可能说得不对，但不会言之无物。他不绕着问题走，而是直截了当把脚踩到问题上去。

当初，吴宓从清华学校毕业后，曾赴弗吉尼亚大学、哈佛大学留学，回国后就在国内教书。十几年后，又曾游学西欧，脑子里有很强的规则意识。某年，吴宓买了三等火车票去宝鸡访友，车厢里一片乌烟瘴气，而且没有座位，他只能挤在过道上。其在路上做事的妹夫王峻生为其送行，看到这种情况，立即将其带到二等车厢的空位上坐下。途中查票，检票员说，“三等票不能坐二等车厢”，王峻生出示证件，对方立即认可。但吴宓再也不肯坐进去，一定要返回三等车厢。吴宓说：困难之时，更要守法，守住自己的清白。

（选自《学习时报》）



文坛走笔

苏东坡的朋友圈



苏东坡到底有多少朋友，怕是谁也说不清。文人皆有个性，一言不合就翻脸，可苏东坡是例外，他对朋友的取舍标准就是“求同存异”，所谓“人有片善便能与之交”。他爱好广泛，庙堂与江湖对他而言殊途同归。他性格外向豪爽，有人曾说他面对什么都说不出的人时就与人说鬼；连说鬼都不想听的，他也要与人“姑妄言之”。是他心里没数吗？显然不是。他胸襟开阔，为人坦荡，且性格奔放，总能看到他人可取之处。

苏东坡人品高洁、爱惜羽毛，但又不拘小节，交友确有失当与失察处，这与他信仰庄子学说有关。苏东坡的朋友圈中既有欧阳修、曾巩、晏殊、黄庭坚、秦观，也有高俅、章惇及蔡

京，更有米芾那种不合群者。高俅落魄时做过苏东坡的随从，帮苏东坡眷文章，跟苏东坡学辞赋。

但苏东坡与朱熹和程颐两位大儒不怎么投缘。朱熹说苏东坡不能为相，“引得秦少游、黄鲁直一队进来，坏得更猛”，苏东坡不以为意。与程颐则因《论语》发生争执：程颐说《论语》讲“哭则不歌”，苏东坡说《论语》又没讲“歌则不哭”，让程颐下不来台。但苏东坡见到程颐依旧尊敬。

那时的文人，个个皆怪杰，他们因才华而相互吸引，当然，也彼此轻视。但甭管政治理念与艺术信仰是否契合，却多数能团结到苏东坡周围。比如米芾，为人有瑕，且狂放不羁，不

是他瞧不上别人，就是别人看他别扭。但其书法绘画独步天下，诗文也属上乘，因其酷爱石头，见到路边丑石，纳头便拜，口称石兄。苏东坡到扬州，江南江北数十名士闻讯聚饮，米芾从数百里外匆匆赶到，只想当面让苏东坡给他个说法：“世人都说我米芾癫狂，请苏学士评理。”苏东坡笑道：“吾从众。”众人哄堂大笑。倘使换个场合，米芾肯定恼了，只因苏东坡在座，米芾始终诚惶诚恐。

苏东坡在东京汴梁时，便是文人中心。以他为核心的“西园雅集”，成为那个时期最有名的文学社。之后，即使他被贬流放，单是黄州一地，因苏东坡到来就聚集起20余人的文学队伍。他在惠州、惠州遂成为岭南读书人汇集的中心。他去海南，从教授当地人发音识字始，到他离开海南时，海南不仅多地可闻琅琅书声，且有了第一个诗社——桄榔诗社。

苏东坡是身体力行突破门户壁垒的人。他兼容了豪放与婉约，打通了庙堂与江湖。

（选自《今晚报》）